苗女善蠱：他者的窺探與想像

范雅琇

一、前言

「蠱」是中國極為古老的文化現象，其神秘色彩和傳說性質，給予人們寬廣的想像空間。尤其從近代許多武俠小說，不論是金庸《笑傲江湖》中的任盈盈，還是《仙劍奇俠傳》的趙靈兒，莫不帶給大眾有關於苗族女子「美麗專情」、「精於蠱術」的印象。然而，「苗女善蠱」是真有其事？還是出於文學和社會對某一族群的窺探與想像？學術界又如何看待關於巫蠱？

巫蠱現象研究一向是學術研究的禁區，早期學者要研究巫蠱，必先經歷「選邊站」的立場抉擇。對於巫蠱文化的相信與否，或多或少影響了學者的詮釋觀點。若以現代科學角度來探究巫蠱，多將之斥為無稽之談；即便有其研究，也不外是把巫蠱與意識形態聯繫起來，認為巫蠱僅僅出自人為主觀臆想，客觀上不存在。反之，深信巫蠱情事存在的人也有，卻因禁忌、難以蒐集資料或無從驗證研究價值而止步。巫蠱研究的限制也隱微暗示：當前為人所熟悉的巫蠱故事，大多是街頭巷尾、茶餘飯後之談，有些來自代代相傳的故事與傳說，有些則是富有想像力的比附或傳聞。即使是中國正史、地方志和邊地遊記的巫蠱紀載，也很難告訴讀者關於巫蠱的真相。

然而，巫蠱現象與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其研究價值除了探討先民的認知想像與信仰術數之起源發展，以及巫蠱在文化和歷史傳承的位置與影響。近代的人類學與文化學研究多關注於此。目前已有不少學者的田調成果、民族研究報告和分析，以理論詮釋巫蠱現象的學者，如美國人類學家黛曼（Norma Diamond）在《苗和蠱毒：中國西南邊疆的互動》中剖析民族、婚姻、宗教之間的他者想像。潘文獻〈苗人、巫蠱：對於他者的想象和指控〉則自述受到奧爾鮑率和波斯特曼謠言理論的啟發，認為謠言是巫蠱信仰存在的重要基礎。¹

本文根據現今為人熟悉的「苗女善蠱」傳說，去省思巫蠱在性別與漢苗文化間的實質意義與權力關係，以及對此傳說的大眾認知是如何形成。雖然在資料的搜尋過程中，極難找到文本和史籍中關於苗家放蠱的記載資料，更多文化學、民族學學者斥責此說為一個充滿漢族歧視的謬誤觀點。然而這個也是可以關注的現象：巫蠱在漢人觀念中如何被視為一個神秘、

¹ 以上學者及研究論述見潘文獻：〈苗人、巫蠱：對於他者的想象和指控〉，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05。關於潘文獻論文，參自網頁：「三苗網」（苗族聯合網：<http://www.3miao.net/>），自2007年7月27日以《苗人與巫蠱》為題連載。故本文引用潘文獻論文，不標頁次。

恐怖色彩的事物，而在文化與性別關係中又扮演著何等作用。

二、中國蠱概念之源流演變

先秦已有關於「蠱」的記載，《左傳》昭公元年：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于文，皿蟲為蠱，蠱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²

在此大約可以猜測蠱是與女色親暱淫亂而得病。「皿蟲為蠱」又可聯繫《說文解字》中的觀念：「蠱，腹中虫也，蠱字從虫從皿」，且《說文》：「皿，飲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義。」在此時期，中國文獻只給蠱下了一些簡單的定義，其中甚至也有矛盾之處。

漢代鬼神觀念大行其道，道教、佛教對於世俗人民蠱毒觀念具有影響，加深了人民對蠱的想像。至魏晉時期，「蠱」似乎得到更進一步的詮釋。最具代表性的是魏晉時期志怪小說，干寶的《搜神記》，在卷十二分別記載「犬蠱」、「蛇蠱」、「張小小」等故事³。此時期，蠱的觀念仍帶有濃厚的神秘色彩，約可歸類出「蠱以不同的面貌呈現」、「中蠱者多為出血慘死，但也有其解藥」、「下蠱者有可能會被反噬」幾種現象。人與此文化現象的交互作用展現出兩個觀念：其一，人從對自然神秘現象的敬畏，發展至利用與掌控這種自然界的現象，去改變與他人之間的關係，為一種「自我概念→自然與人→人與人」的演變。其二，在下蠱與解蠱的儀式中，人開始複雜發展自然原始現象的概念，且更有其神秘想像，甚至產生人為的「轉嫁災禍」。南北朝時期，由於江南開發的過程中移民與當地居民的矛盾和摩擦加劇，當時已經出現有關對於南方畜養蠱蟲的指控⁴，不過大多還發生在漢人居住的區域，可見以巫蠱作為對他者的想象和指控在當時流傳廣佈。

殆及隋唐，官方史書已開始將巫蠱視為史實。

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如蛇，小者如虱，合置器皿中，令自

² 李卉：〈說蠱毒與巫術〉，《二十世紀民國民俗學經典：信仰民俗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179。

³ 〔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台北，里仁出版社，1970）。如〈犬蠱〉：「鄱陽趙壽，有犬蠱。時陳岑詣壽，忽有大黃犬六七群，出吠岑。後餘伯婦與壽婦食，吐血幾死，乃屑桔梗以飲之而愈。蠱有怪物，若鬼，其妖形變化，雜類殊種，或為狗豕，或為蟲蛇，其人皆自知其形狀。行之於百姓，所中皆死。」；〈張小小〉：「餘外婦夫，有傭客，得疾下血。醫以中蠱，乃密以囊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狂言曰：『食我蠱者，乃張小小也。』乃呼小，小亡去。今世攻蠱，多用囊荷根，往往驗。囊荷或謂嘉草。」

⁴ 同注1。樑顧野王《輿地志》：「江南數郡有蓄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食飲中，人不覺也。其家絕滅者，則飛遊妄走，中之則斃。」潘文獻指出對這種魔幻性的巫蠱指控與對於一般巫術指控的最大的不同，在於蠱蟲是不需要存在的，對於這種巫蠱的指控的證據可以是莫須有的罪名。

相食，餘一種存留之，蛇則曰蛇蠱，虱則曰虱蠱，行以殺人。使人食之入腹，蠱食其人五臟。人死則其產業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他人，則畜蠱者自鐘其弊。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隨女子嫁焉。⁵

《隋書》的制蠱方法成為一種「巫蠱原型」，後世多襲。傳播地點也轉移到南方各省，此時中原與江南的互動交流更頻繁。唐代沿襲了《隋書》造蠱之法的記載，並發展許多「解蠱」秘方，可見人民對於蠱的禍害更深信不疑。唐代孫思邈《千金方》的記載⁶提及：「江南數郡往往畜蠱」，可見人們對放蠱者的想像已由轉變到江南的山間人身上，不過也有人持反對意見，認為這是南方山川地理環境溼熱所致。

宋代巫蠱傳說更加盛行，尤其在福建地區。從漢人勢力的移轉來看，福建地區不再是遙遠的邊陲，由中原和山東移民過去的人很多。因此，對土地、水源的爭奪常常引發宗族械鬥，彼此產生一種族群矛盾。巫蠱的指控也成為一種用以排斥他者的手段。此外，除了民間的口耳相傳，文學作品也在對社會傳播巫蠱的想像，如洪邁的《夷堅志》。元代，巫蠱記載的地域發生變化。《元一統志》記載清湘(今廣西全州)「峒、僚錯居其壤。山有毒蛇，儲之為蠱以中人，立死」，可知廣西被納入想象和指控的地域之中，且與少數民族發生了聯系。明代，漢人對於巫蠱的指控，除了福建、廣西，更拓展到甘肅、湖南、貴州、雲南等地區。這些傳說與謠言在制造、防範、判別蠱毒等方面，基本上沿襲前代說法，只是具體記述時有一些調整和修改。

梳理歷史文獻可以發現，「巫蠱」的想像建立在人們推測疾病原因的基礎上，透過一系列復雜的思考程序，最終建立起來，並且一定的社會與文學條件，巫蠱被納入「史實」系統。潘文獻指出：「巫術和巫術思想作為這種想像的外部土壤，為其提供了精神空間。自然疾病的存在則是這種想像得以生根發芽的依附點。佛教和道教影響下漢人社會的鬼神觀念與志怪小說的融合逐步衍生出一種魔幻的、恐怖的『巫蠱』傳說。」當這種鄉野傳說透過文學和社會傳播，滲透入歷史體系，關於畜養蠱蟲的他者指控被官方接受採納，民眾也不自覺地受到這種巫蠱論述的影響。故此，以上各朝代的巫蠱想像雖有明顯的承續關係，但是各朝代有其不同的特點。也許可作為漢人遷徙邊疆的過程中，族群之間存在的緊張關係以及社會衝突的一個註解。

三、苗疆蠱毒的故事

⁵ 同注1。《隋書·地理志》詳細記載了制蠱的方法，可見巫蠱情已在官方歷史中得到承認，並且記載下來。

⁶ 同注1。孫思邈是唐代著名的醫學家，代表醫學著作有《千金方》和《千金翼方》，取「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之義。他提到：「凡人中蠱，有人行蠱毒病人者。若服藥知蠱蟲姓名，當呼喚將去，若欲知蠱主之姓名者，以敗鼓皮燒作末以飲，服方寸匕。須臾，自呼蠱主姓名，可語令去則愈。又有以蛇涎合作蠱藥著飲食中，使人得瘕病者，此種積年乃死，療之各自有藥。江南山間人有此，不可不信之。」

(一) 南方少數民族與苗族蠱術

明清之前，巫蠱想像和指控很少發生在西南地方，關於苗人放蠱的說法也很少。明清以後，關於苗人或少數民族放蠱的傳說多了起來，並且「放蠱」似乎成了苗人或少數民族的專利。明清文人筆記中，以不同地域、形式所流傳的蠱毒都被紀錄下來，也許欲圖取信讀者，所以情節繪聲繪影的程度尤甚魏晉，並且開始對南方民族的蠱毒術感到既恐懼又好奇。如以下二則出現於明清文人筆記。

苗人能為蠱毒。其法五月五日聚毒蟲于一器之中，使相吞噬，并而為一，乃諸毒之尤者也。以之為蠱，中者立斃。然造蠱之法多端，如有所謂金蠶蠱、蜈蚣蠱者，其術不可思議。大約用其蠱，恒在冷茶冷酒中，即菜蔬肉食中第一塊也。（《峒溪諸苗奇俗彙志二》）⁷

苗家造蠱，每於端午聚蜈蚣、虺、蝎于一器而咒之。積久启視，留其一則為蠱。取其涎矢以毒人，奇病百出，即數年後千里外無得免者。凡遇夜間空隙如流星閃電，即放蠱出飲也。長者為蛇蠱，圓者為蛤蟆蠱，而以金蠶蠱為最毒。蓋一寨中輒有兩三家也。（清代王韜《黔陽苗妓紀聞》）⁸

以上顯示，苗人制蠱的方法其實不出於《隋書》所載，端午時節聚百毒蟲物於一皿，使之相噬，煉成蠱毒，只是在此制蠱者變成少數民族，尤以「苗族」為多。此外，蠱除了有「金蠶蠱」、「蛤蟆蠱」、「蛇蠱」等形名之別，蠱在夜間出沒活動的過程也被文人具象化，恍若其親身見聞。復次，蠱在中國歷史上能夠「害人以致富」的記載，也被活生生嫁接到了苗人身上。總而言之，從此處可以看到文人對異族賦予想像的過程，儘管是利用自身傳統的巫蠱認知，移轉到其他民族身上，似乎也是理所當然，甚至將苗族巫蠱想像的更加神秘、恐怖。

(二) 少數民族女性與苗女

明清漢人除了將巫蠱想像聚焦在少數民族，更有一個特別的現象是對於少數民族女性的指控，且似乎女性下蠱通常與商賈的婚戀有關。如以下二則：

西粵土州，其婦人寡者曰鬼妻，土人弗娶也。粵東之賈客多往贅焉。欲歸則必與要約，三年返，則其婦下三年之蠱；五年則下五年之蠱，

⁷ 同注 1。此則說明苗人端午造蠱，種類多端，而下蠱多透過食物酒菜。

⁸ 同注 1。

謂之定年藥。愆期則蠱發，膨脹而死。如期返，其婦以藥解之，輒得無恙。以蠱留人，人亦以蠱而留。（《廣東新語》卷二四）⁹

有山中擺夷，剝全牛，能咒其皮如芥子。貨客入山不戒，或為夷女所悅，當貨必言歸，即私投飲食以食客。女約來期，如約至，乃得解；逾期，則蠱作腹裂，皮出如新剝者。（張泓《滇南新語》）¹⁰

有關南方邊境的少數民族放蠱的傳說，目的除了移人財物、轉嫁禍端之外，以少數民族婦女用來控制外籍丈夫和情人的手段最為聞名，尤以苗疆女子為代表。雖然文獻提到有養蠱風俗的化外民族不在少數，如土族、壯族、侗族等等，似乎在漢人的普遍印象中，「苗女善蠱」成了少數民族女子美麗神祕之形象，使他們又愛又怕的膜拜。

尤其這類關於商賈娶外族妻子的故事，商賈總是成為受害者，外族女性總是具有神祕邪惡的力量。在在反映了對於漢人對異族美麗婦女的懷疑和恐懼想像。更有趣的是，漢人將這種苗族善蠱的想像發揮到極致，美麗苗女的形象似乎深植人心，儘管回顧文獻，最初的苗女不一定是美麗的，甚至下蠱不一定是苗女的專利。

真蠱婦目如珠砂，肚腹臂背均有紅綠青黃紋路，無者即假。（《永綏廳志·卷六》）¹¹

苗婦能巫蠱殺人，名曰放草鬼。遇有仇怨嫌隙者放之，放於外則蟲蛇食五體，放於內則食五臟。被放之人，或痛楚難堪，或形神蕭索，或風鳴於皮膚，或氣脹於胸堂，皆致人於死之術。……。（《乾州廳志·卷七》）¹²

從上述說法看來，實在難以令人想像：「目如珠砂」的「草鬼婆」，如何跟一般認為美麗多情的「苗女形象」產生聯繫？這就要牽涉到漢人和苗人同樣對「可能有蠱」的苗族女性，進行著一種他者的凝視。在不同文化與社會觀點之下，「她」可能是令人遐想卻望而生畏的「美麗苗女」，也可能是受到社群排擠、地位低下的「蠱婦」。

四、「苗女善蠱」背後的性別、婚姻觀點

談論漢人「苗女善蠱」觀念之前，本文試從「性別」觀點討論苗女對「婚姻」的態度。除了在歷史與時代變遷之下，異族互相通婚的事實促成

⁹ 同注 1。在此可看到南方民族與漢人商賈的婚姻關係，其實也有一個因素是由於當地人不願娶守寡或某些有特殊狀況的女子。

¹⁰ 同注 2，頁 188。

¹¹ 同注 1。

¹² 同注 1。

這樣的傳說，其實還是可以回到性別與婚姻的本質去看，亦即本文要討論何者牽起了苗女與漢人的紅線。

在巫術系統和原始思維中，有一個跟蠱毒術相似的系統，那就是愛情與合和法術。無論是求愛秘方、迷魂藥、促進夫妻和睦的合和術、房中術，都和性別、性、婚姻的關係匪淺，也有學者認為蠱術是從愛情巫術衍生出來的形式之一。雲南少數民族中普遍存在著原始信仰與思維，性愛巫術即屬於其中一種秘術。由於受到對自然事物和人有限認識能力的制約，她們幻想著通過巫術使異性受到誘惑，認為此術可以感應且取悅於異性。性愛巫術的形式多種多樣，例如：勾魂巫術、符咒和某些動物、植物配置的藥物，可激起對方的愛與性欲。可說合和草或媚情之藥與蠱術之本質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也許起初苗女使用愛情巫術欲圖吸引對方，甚至最後要用巫蠱來控制對方，與其說這是苗女在母系社會逐漸被男性侵吞後所進行的反抗，苗女也被迫退除女巫之身分，只能淪為使三流愛情巫術的蠱婦，不如說是一種女性追求情愛、婚姻和諧所做的努力。

筆者認為不論戀愛巫術和巫蠱，若純粹以從性別對立來剖析可能會有失真，因為不論愛情從兩性出發，陸續衍成婚姻家庭（無論是少數民族的走婚或漢人的大家庭制），甚至承諾變質而產生的恩怨情仇……都是後來的事，回到情的本質面來看，純善、和諧的狀態，是普天下人們所欲追求的。

五、「他者」的窺探與想像

（一）漢人文化觀看「苗女善蠱」

明清文人對於苗族女性與漢人男性的婚戀故事之紀錄，大意不外乎是：漢家青年因故來到苗寨，美麗的苗家女兒心生戀慕，最後招漢家郎為婿，恩愛數年。即夫婿思鄉求歸，苗女防其背信赴約而於酒食中下蠱毒。期滿而返，苗女予以解藥；若至期滿而未歸，蠱蟲一出，夫婿則肚破腸流而死。此為「苗女善蠱」的典型意義。

雖然漢人看似只有歸與不歸的生死抉擇，也總是受害的一方，但傳說中還有第三種結局：漢人青年於返回苗寨的過程中，耽誤時程，死於苗女家不遠處，苗女持解藥倚門望歸不得，奔而尋之。最後看到丈夫已死，苗女又傷悲又安慰，悲其丈夫枉死，然又以丈夫不背信諾而欣慰。因此，苗女自服毒藥以殉情。這個結局比較淒美，但也是值得深思。

黛曼認為苗漢之間有顯著差異的社會結構、文化實踐和文化觀念，以及雙方維持顯著民族邊界的願望造成了漢人對苗人的巫蠱想象。¹³ 她的論述分析如下：

漢人社會男尊女卑，而苗人社會男女都被重視，有「不落夫家」的

¹³ 同注 1。潘文獻完整引述並呈現黛曼《苗和蠱毒：中國西南邊疆的互動》的重點。

習俗。相較之下，苗族婦女地位似乎比漢族婦女要高。漢人社會欣賞婦女纏足小腳，儒家要求婦女遵從「三從四德」。苗人社會婦女赤腳行走。未婚苗人男女同歌共舞，一同飲酒、嬉戲調情。苗人青年女子婚前可以自由戀愛，甚至偷跑到男家。苗人社會婦女再婚和離婚一般為社會接受。另一方面，苗人婦女又擔當一些在漢人社會中只有男性才能擔當的角色。苗人婦女的形象是儒家倫理道德難以接受的。

故此，苗人的宗教信仰與傳統被漢人視為異端邪術。漢人想像並斷言苗人缺乏性道德（出於維護儒家倫理的需要）。漢人社會困惑於婦女不纏足，不嚴肅的舉止，婚前性行為，缺乏社會乾預和家庭選擇的擇偶方式，男女同歌共舞、縱情飲酒等等。漢人對苗人婦女的經濟角色和社會角色感到不安。對苗人起義的恐懼與對社會秩序紊亂的恐懼，對異端的恐懼，對文化喪失的恐懼交織在一起。這些使得漢人社會發展了對周圍的異族、對於頻繁接觸的他者的巫蠱想像。

據此可知，漢人在移民或接觸南方民族，對於各種各種潛在危險感到多麼不安和憂慮。不僅從生存環境上，來說開發南疆，難免浸淫溼熱瘴癘之氣；在道德意識上，苗人性別和婚姻觀念與傳統儒家又不同。儘管因為各種理由，兩族開始通商、通婚，漢人卻始終想像南方的少數民族使用蠱毒來毒害他們，並且對此保持警惕。苗漢矛盾加劇，原本始於苗漢之間在社會結構、文化實踐和文化觀念有顯著的差異，而後漢人以主流姿態對於苗族的巫蠱想像又加深了歧見。特別是想像苗女放蠱，是從種種疾病、謠言以及文化差異的情況下，漢人對苗人感到的恐懼。

當然基於此緣，有幾個問題就因應而生：蠱的觀念是邊疆民族原生自有？還是受到漢人巫蠱觀念的傳入（或定義南疆民族善於蠱術），而被邊疆民族納入其原始信仰，而成為駭人聽聞的事實？兩個民族對望凝視的同時，是否看到的為對方的真實面？而漢人觀點又如何重新詮釋解讀「苗女善蠱」這一傳說？

根據黛曼的分析，筆者認為上述所談到的「苗女善蠱」，演變成最後「苗女殉情」，就是漢族詮釋觀點下的角度。在苗族母系社會的脈絡，女性是最重要的子嗣及種族延續之保證，而男性則輔佐女性以致於將任務完成。即便是通婚、入贅、走婚，女性對於性和婚姻的選擇也是以延續族群為主，其子嗣也會受到全族人的祝福和保護。苗女有情而下蠱，破迫使丈夫情郎回歸苗疆榮盛部族，但若不成，再尋另一個目標亦非不可。

因此，「苗女善蠱」這句話還有下文，也就是漢人刻板印象中的「苗女多情」。苗女殉情非苗家本色，並非否認苗族女兒沒有為情而生而死的壯烈勇氣；而是這些殉情、守節之觀念，雖用淒美浪漫的死亡來妝飾，終究是漢族傳統對於女性人格的標準與要求。也只有尋求這個解釋途徑，能讓

漢人社會接受他族在文化上的歸順與臣服。因此「苗女善蠱」的變相傳說，或能反映了漢族基於族群本質，處在中國文化的中心，有其權力支配族群與性別關係，而對苗族所下的一個定論。

六、結論

佛洛伊德說：「魔法的本質即是將理想和真實事物之間作了一種錯誤的聯接，人們將自己理想的次序誤認為即是自然界的次序，於是幻想著經由他們思想的作用能夠、或者似乎能夠對外在事物作有效的控制。」因此無論那一個古代文明，都有其神秘唯美的原始宗教信念，並衍生出複雜的形式。

東方學學者薩伊德的族群觀點給了我一些啟示。如果漢族與苗族互為文化他者的關係，如果「苗女善蠱」的想像是漢人而為，那麼關於這個創造的概念，就不是單純的只出於憑空幻想，想像的基礎不存在於過去的或現在的苗家之真實呈現，而是存在於當時漢民族相對於苗疆民族的結構環境裡，更進一步的去談，也會發現這是「漢人男性」對「苗族女性」的失真的觀察。換句話說，漢族對苗疆的想像本身存在於一種權力結構與支配關係之中，而這種存在關係是真實的。

對於他者關係的思考，黛曼對於漢苗關係的研究，以及潘文獻從苗族社會內部拓展的視野，無疑在本文論述中扮演極重要角色。尤其是潘文獻的研究；因為在研究之初，筆者並未想像到苗人社會中也存在另一層的他者關係，故純粹以受武俠小說薰陶後感到耳熟能詳的「苗女善蠱」切入論述，一味的追尋起「美麗神秘」、「浪漫多情」又「精通蠱術」的苗女形象來了。潘文獻的研究無疑帶給筆者更多重新認識思考這個主題的機會，筆者願秉持著謹慎而多元的思考，以謙卑的態度繼續發掘。

在搜尋資料的過程中，發現民國之後許多作少數民族研究的學者，努力將巫蠱之形象從少數民族身上拂除，以找尋不到科學和文獻之證據，去反駁歷史文獻中捕風捉影式的陳述；而更令人訝異的是人們的態度，現今有些民族連這一段歷史記憶都付之闕如。真真幻幻、假假真真，好像已經不是值得被在乎的重點了。對於苗家女兒來說，全身盤滿美麗閃耀的銀飾，展現苗族風情的傳統服裝，以熱烈的人情味招呼觀光客和尋幽者，他們跳著豐收祭典的傳統舞蹈，慶祝女兒們的節日，才是他們現在努力延續的一切傳統。也許這也是所有民族對於自身文化的省思：過了歷史的篩子，塵埃落定，只有最美好的記憶會留下來。

七、參考資料

張詠雅：〈漢文化視野下的蠱——以清代嶺南為例〉，《中正歷史學刊》第八期，2006。

潘文獻：〈苗人、巫蠱：對於他者的想象和指控〉，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05。